

## 积极翻译腔刍议

冯曼 段安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

**摘要** | 翻译腔因受到源语形式的束缚, 未能将源语表达的多维信息按目的语规范进行顺畅表达, 一直以来饱受诟病, 成为翻译能力提升必须克服的顽症。然而, 译者面对两种文化在认知、审美和社会规约等诸多差异而产生的译文, 本就是介于源语与目的语作为母语创建文本之间的特殊存在, 本质上而言可视为一种中间体。这种中间体属性是否意味其连续统区间或会存在翻译腔合理的生长空间? 现有的“翻译腔”研究多停留在语言层面, 忽略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以及译者的主观能动选择。本文从辨析翻译腔释义入手, 剖析了其产生的各种原因, 从译本作为不稳定的中间体这一视角, 将其区分为消极和积极的翻译腔, 指出应辩证地看待这一现象, 以译者的“真诚”打造积极的翻译腔。

**关键词** | 中间体; 积极翻译腔; 消极翻译腔; 合理度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语言产生于社会生活,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演变。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少挑战, 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数情况下, 人们认为翻译腔是译者过多地受原文语言形式束缚、机械移植原文语法框架所致, 视之作为一种消极的语言现象。然而, 纵观历史, 语言的发展演变历经优胜劣汰, 有些翻译腔不仅得以保留, 还丰富了汉语表达, 为本土文化增添了新的养分。如何正确看待翻译腔, 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翻译腔进行探讨, 以期大家对这一现象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 一、翻译腔定义之辨

“translationese”一词最早见于美国翻译理论

家尤金·奈达在其著作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中的论述, 奈达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忠实, 结果导致不忠实于原文信息的内容和效果, 使译文不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杨普习等, 2009: 52-54)。国内诸多学者也对 translationese 有所论述, 如范仲英(1994: 98)在其著作《实用翻译教程》中对这一现象作了介绍, 认为 translationese 可视为 translation syndrome, 即“翻译症”的对等翻译; 这是翻译实践中的常见病, 即机械照搬源语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句法结构形成一种不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语言混合体。陆谷孙(2000: 2013)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对 translationese 的定义为: 表达不流畅, 不地道的翻译文体; 翻译腔, 诘屈聱牙的翻译语言。刘宓庆所

著的《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及 translationese 时取“翻译体”一词作为其对等翻译，并认为翻译体带有贬义，指“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带有翻译色彩的译文（刘宓庆，1998：590）。

由以上种种定义可见，不同学者对 translationese 的译名选词并不统一，有人称“翻译症”，有人称“翻译腔”，还有人称其为“翻译体”。严格来说，这三种命名在语义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相比较而言，“症”与“腔”的语义韵偏消极，常见搭配如耳熟能详的“病症、顽症、症结；油腔滑调、拿腔拿调、耍花腔”等，而“体”的语义韵则为中性。从语义强度而言，“症”的强度甚于“腔”，往往需要医治。将不合译语规范的译文归结为某“症”，主要是担心这一症状蔓延开来影响目的语生态。而“腔”的理解则更多地指向译文不符合译语表达习惯而有失自然、不够流畅的翻译现象。尽管语义上存在差异，但学者们对翻译症和翻译腔的理解大抵是相同的。比如，方梦之（2003：26）在《译学辞典》中所述：翻译症，主要特征为文笔拙劣，即译出来的东西不自然、不流畅、生硬、晦涩、难懂、费解，甚至不知所云，其所描述的范围与与翻译腔并无二致。而“翻译体”则很容易与“文体”产生联想，意指某种译文风格。虽然刘宓庆将 translationese 译作“翻译体”并认为其带有贬义，但由于“翻译体”指向的是译文的用词、词序以及句法，与“译文风格”存在语义上的天然联系，因此往往不难听到文学翻译中关于翻译体的不同声音。一些遵循源语风格、打破译语常规的翻译体往往具有自身独特的“美学品格”（冯兴石，2003：95），它使得原文中一些新奇的语言表达方式得以保留，这些表达方式反映了异域的思维模式和风土人情，可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集中体现了积极的文学手法。考虑到翻译是人类最为复杂的社会活动，以及译文产出背后的诸多操控因素，若仅从客观描述不符合译语语言规范的翻译现象而论，笔者认为消极语义较弱的翻译腔作为译名更加中肯一些。

## 二、翻译腔产生原因之“辨”

上述讨论将翻译腔定义为某种客观翻译现象的描述，对该现象的产生，不妨从多个视角进行剖析，如此才能得到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 （一）语言形式束缚

翻译腔产生的一大原因，是译者未能突破原文表层结构束缚，将源语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句法结构机械地移植到译语中来，从而造成过分的形式对等。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英语重形合，多主从复合句，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依靠连接词或语言形态手段来实现；而汉语则重意合，多并列分句，不强求形式上的显性对应关系，更多凸显语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试比较以下译文：

例 1: The idea that the life cut short is unfulfilled is illogical because lives are measured by impressions they leave on the world and by their intensity and virtue.

译文 1: 被削短的生命就是一事无成的观点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人生的价值是由它们留给世界的印象和它们的强度及美德度量的。

译文 2: “生命短暂即不圆满”，这种观点荒谬无理。生命的价值在其影响、在其勃发、在其立德于世（李淑琴，2001：42-46）。

译文 1 在句式结构、遣词造句、语序方面均保留了原文“形合”的痕迹，如：“……的观点是……的”，对代词 they 的理解以及被动语态的处理等。如此照搬英文结构，必定造成译文生硬牵强，产生无助读者理解的翻译腔。译者在翻译时往往会受到原文语法句式的重重束缚，其受影响程度与往往与译者的语言转换能力有关。翻译新手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往往无法跳脱原文形式的拘泥，造成翻译腔问题。

### （二）认知差异束缚

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各民族的文化系统存在巨大差异，文化缺省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王东风（1997：56-61）在《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一文中提出，由于作者与意向读者拥有共同的文化身份或文化背景，作者往往会在文中省略掉他认为与读者共有的无需赘言的信息。原文读者了然于胸的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知识可能并不存在于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系统中，从而造成理解障碍甚至误读。一般说来，译者通晓两种文化，对于普通的文化缺省，可以通过帮目的语读者搭建源语文化认知结构，建立必要的连贯解决此问题。但是，一些特定的认知内容，尤其第一次引进时，都要经历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吸收的过程，译者很难做到第一次

就找到合适的译法。回顾社会科学引入新词的过程, science 先音译为赛恩斯, 后译为科学; democracy 先音译为德漠克拉西, 后译为民主; bourgeois 先音译为布尔乔亚, 后译为资产阶级 (刘重德, 1998: 50)。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当人们对引入概念认知有限, 多会采取音译、直译甚至零翻译的译法, 实属认知差距无法合理弥补时的一种权宜之计。等到认知成熟, 再根据已经加深的理解, 重新选择更为合适的定名, 甚至包括从已经引入相关概念的临近文化中选取。比如上述术语, 由于日译术语与汉语的兼容性再加上当时西学取道日本以及中日交流甚多 (廖七一, 2017: 28-30), 后一种译法实际上是最终采纳了日文译名。当然,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 许多约定俗成、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对整个社会知识体系亦不产生重要影响的词也不一定非要推翻原有译名, 比如培根 vs 熏肉、芝士 vs 奶酪、的士 vs 出租车、夹克 vs 外套等词共存。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 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暂且略去。

新事物的出现对应着新概念和新的表述方式, 如果认知不对等, 译者在本土语言中寻找对应表述或者创造新的表述肯定存在困难。术语尚且如此, 更不谈相关的全新表述了, 翻译腔问题自然难以避免, 这也属于翻译在一定时空内不得不面对的遗憾。但是, 随着人们认知的不断发展, 最初的译语表述也会逐渐摆脱早期的形式, 寻求一种更加稳定、便于大众认知以及普遍接受的形态。因此, 由于认知差距造成的翻译腔, 是译者为读者搭建认知图式提供的一块碎片,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会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自我修复。

### (三) 话语权力约束

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他的理论中, 话语是权力的理论表现形式, 是施展权力的工具, 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 (Foucault, 2017)。中西方的宗教传播皆体现了权力话语对翻译的操纵。佛教传入中国之初, 由于梵文和汉语相差迥异, 翻译方式多由外籍僧人诵出原典, 按源语语序译成汉语, 再按汉语行文习惯进行改写。梁启超指出: “(佛经)译业起于汉末, 其时译品,

大率皆未熟的直译也。”“吾辈读佛典, 无论何人, 初展卷必生一异感; 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其显著特征: ……(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子法极多……”(刘宓庆, 1999: 136)。佛经翻译发展至唐代, 玄奘提出“五不翻”原则并总结音译法规律, 除了有不可译因素, 主要原因还在于: 佛教在中国虽依附世俗权力, 比不上欧洲宗教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以及后来政教合一的局面, 但是对于其信众也是神圣至上, 为了保留佛教文化的语域特征(神秘、庄严、祈祷以及咒语等特色宗教功能)。这些佛经翻译的译法原则, 多体现了对原作权力话语的顺应, 其背后就是对神圣宗教的仰视与维护。而佛经历千年的传播, 当年那些难懂的佛语不断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 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语言以及文化的发展。

在西方翻译史上, 《圣经》翻译与宗教权力话语的联系更是密不可分。宗教文本的不可侵犯性要求译者必须对原作秉持虔诚的态度, 保持其原状不得更改。如果译者对这一权力话语发起挑战, 后果将不堪设想。早期西方基督教会神学家、宗教翻译家哲罗姆因主张“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 不相信在用词造句上会有什么“上帝的感召”, 受到了传统势力的指责和来自各方的无情抨击(方梦之, 2004: 375);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 Martin Luther 因反对教会的权力话语, 创造出一种通俗的、能为大众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而遭到迫害; 同时期, 英国新教改革派 William Tyndale 也因试图从新教徒立场翻译《圣经》而被教会处以火刑(于建红, 2008: 305)。中西方的宗教翻译实践都表明, 除了语言操作平台起着显性作用外, 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隐性作用力也对翻译活动施加着影响。

再观政治文本的翻译,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背后是一套政治话语体系作为支撑, 为保证国家机构话语不被误读, 译者需遵循严格的外交翻译准则, 国家也在不断推进相关标准化建设, 比如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主持建设了首个国家级多语种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 中译语通建设了多语种的中国核心语汇网站等。许多政治文献的译文, 在西方人看来, 打上了太多中国思维和中国特色, 于他们而言显然带有翻译腔。可这样的翻译腔难道不是维护国家主权必须的吗? 在反对

英语霸权的今天，英语译文中多一点民族思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四）翻译目的约束

译者的翻译行为总是受到一定的翻译动机驱动，综合考虑翻译涉及的各项因素以及翻译行为面对的各种社会关系，译者会确定明确的翻译目的，创设信息传递目标。翻译目的不仅会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还会影响其对原作的解读、翻译策略的选择等过程。

翻译目的对译者的影响在特殊历史时期表现尤为明显。五四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力量在译坛上掀起的“直译之风”，试看这一时期的译文：“两人贪婪地吸了没有盐的刁弥沙。一看见乏透了的可怜的毕加的模样，美谛克总不得不记起曾使他心醉的坐在幽静的苇荡旁边的那闲静的，爽朗的老人的形相来。毕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压碎了似的神情，在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鲁迅译《毁灭》，1931：82）。如此费解之译文，放在现在必然会被不少人扣上“翻译腔”的帽子，但若以译者的政治目的为考察对象，就会明白这只是形式上“诘屈聱牙的翻译语言”，是译者故意在译文中引进异质，试图以新的语言文字、新思想及新文化破除封建思想的桎梏。

此外，文学翻译中审美目的实现也是评价翻译效果的重要标准。不同于其他语言形式，文学是对语言的一种创造性运用（Fowler, 1986: 13），这种创造性体现在文本特定的变异或陌生化体系中。如果译者未能识别出原文中变异所蕴含的诗学价值，或因能力有限放弃对原文中常规和变异之间张力的建构，就无法建立起原文固有的文体连贯（王东风，2009：63-68）。对于译语读者，读懂来自另一种语言的变异实属不易，不免给译文打上“翻译腔”的标签。通常情况下，文学文本中的“缺环”或“空白”是作者特意留之，以此来召唤读者参与到文本的连贯建构中。如果译者发现了这些“空白”的美学价值，认可文学语言的诗学或审美价值，就会对其加以保留，由此产生的翻译腔则是译者为了审美目的有意之作。

### 三、作为中间体的翻译腔

正是因为翻译腔的存在呈现出多种形态，其生

成原因也各不相同，那么，翻译腔是否本身就是一个区间，能将我们上述阐释的不同情境全都包括进去？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

将翻译腔视为中间体为作家三盅（2012）最先提出，其研究未能展开论述，只是慨叹“翻译腔是作为中间体的存在”。笔者引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中介语”（Selinker, 1972）对所有译语进行类比。译者首先要习得二语，学习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的中介语体系；这一体系反过来会影响译者实践。译者熟知两种语言与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也会无意地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规则运用到对原文的理解和译语表达过程，译文会偏离以两种语言为母语直接写作的作品。鉴于此，所有译文都可看作是中间体，翻译产出的是既不同于源语文本，又不同于目标语直接写作的文本，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中间的存在。译文的中间体属性使得翻译文学同本土文学、外国文学区分开来，以独有的身份与后两者并置共存，彰显出语言表达的生命力和文学创造的无限可能；翻译腔既是译文的一种，也会继承其中间体不稳定的性质，而这种不稳定性本身就预示着翻译腔存在一定的连续统，在该区间内或会存在合理和不合理的空间。

### 四、消极与积极的翻译腔

多数情况下，人们将翻译腔看作是一种消极的语言现象，但从上文翻译腔产生的原因来看，这种现象并非只是在语言层面上机械转换的结果，还渗透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译者的主观选择。随着翻译理论的成熟和多元化翻译标准的建立，国内外有学者已不再将翻译腔视为完全被西化的、生硬晦涩的语言。吕俊（2001：316-318）在《英汉翻译教程》中以翻译腔的功与过为题对 translationese 作了一分为二的介绍：翻译腔破坏了译入语的风格，但在表达方法的引进、新词语的译介、语言表达形式的改革等方面的确起过不容低估的历史作用。西方著名学者 Lawrence Venuti 也曾表示，紧贴原文并不是要让译文不通顺，保持译文语言的差异性也不等于不通顺，而是要取得一种新的可读性（Lawrence Venuti, 2007：87）。这种新的可读性由译者所创造，即不能为了符合目的语原有的语言规范而放弃对文本的贴合，而应该有所创新，创造出能够为目的语所接受且忠实于原文价值的译入方式。通过保

留原作品中非汉语式的表达和审美旨趣,积极的翻译腔可以用来传递源语所承载的差异化信息和文化价值。

积极的翻译腔往往是译者有意为之,文学翻译中大有体现。如在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一位叫 Peggotty 的渔民,因为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常常说出一些不合语法的句子,例如: We was living then in a solitary place, but among the beautifullest trees. 一个译本这样翻译:“我们那时住的地方很僻静,四周是各种美丽的树木”(英语学习大书虫研究室,2001:1045)。试比较另一译文:俺们那时待的地方挺背,前后八方的林子说不出的最漂亮(张培基等,1980/2001:8)。对比可知,尽管译文一读起来明白晓畅,但却并不是合适的译文,因为译文所体现出来的语言造型无法让读者联想到说话者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而译文二中将原文主语 We 译成了汉语中具有鲜明农村方言的“俺们”,将不合语法的 beautifullest 别具匠心译成“说不出的最漂亮”,再配以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前后八方”来强化“低教育程度+农村人”这个人物原型的整体形象,以病句对病句,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显然是在有意识的把握中(王东风,2014:9)。这样的译文虽然带着些许翻译腔,但却忠实的传达了原文的艺术表现手法,此类翻译腔的存在可以为文学翻译锦上添花。

此外,译者秉持的文化伦理也赋予翻译腔一定的合理空间。从杨宪益夫妇所译的《红楼梦》中可略窥一二,其中,杨译中国传统文化层面的词语时均照字面直译,尽可能保留中国文化色彩。对比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他将原作中对红色的描写,一律用其他词代替甚至略而不译。虽然霍译较符合目的语习惯,不存在“拖泥带水”的翻译腔,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这种毫无根据的改写势必会阻碍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刘重德,1998:50)。从这个意义上讲,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如果能坚持积极的翻译腔,也可视为是对强势文化的反抗,体现出一种“不服从”的翻译策略。而强势文化译入弱势文化,译者则可以有针对性地筛选,针对本土所需要的异域文化价值保留一定的翻译腔。这样的辩证处理,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平等,也能和谐地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 五、结语

由此可见,积极的翻译腔往往体现的是对他国文化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异质价值的接纳与尊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翻译腔现象。一方面,要警惕译文中消极翻译腔的滋长,正视其危害并探索改进方法;另一方面,也要肯定积极翻译腔的价值,讨论其适恰的场所和合理的范围。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有文本外翻译活动带来的社会角色,同时还是文本内社会角色的观察者、阐释者和评判者(冯曼,2018:75),译者应在多重角色间作出协调,妥善处理文本内外的社会关系,以真诚的态度创造出符合社会发展、文化保护、审美创造等诸多目的之下的积极翻译腔。

## 参考文献

- [1] Nida E A, Taber C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Bill Press, 1969.
- [2] Venuti L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 [3] 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方梦之. 译学词典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5] 冯曼. 翻译伦理研究——译者角色伦理与翻译策略选择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 [6] 冯彤. “翻译腔”例析 [J]. 中南大学学报, 2003(4): 558-559.
- [7] 范小飞. 中介语理论观照下的汉英翻译腔初探 [D]. 中南大学, 2009.
- [8] 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9] 李淑琴. 语境——正确翻译的基础 [J]. 中国翻译, 2001(1): 42-46.
- [10] 李颖玉. 基于语料库的欧化翻译研究 [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 [11] 廖七一. 严译术语为何被日语译名所取代? [J]. 中国翻译, 2017(4): 26-32.

- [12] 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 [13] 刘重德. “欧化辨析” [J].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5): 47-51.
- [14]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15] 吕俊. 英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6] 孟庆升, 李孟南. 权力话语对宗教翻译的操控 [J]. 语文学刊 (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0 (2): 42-43.
- [17] 三盅. “翻译腔”是过渡性文化现象, 但会长期存在 [J]. 文汇报 (译海拾贝), 2012 (9).
- [18] 王大为. 从翻译的文化功能看翻译中文化缺省补偿的原则 [J]. 外语研究, 2004 (6): 68-70+77.
- [19] 王东风. 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7 (6): 56-61.
- [20] 王东风.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J]. 中国翻译, 2000 (4): 3-9.
- [21] 王东风. 连贯与翻译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22] 杨普习, 刘典忠, 周小岩. Translationese: 翻译体? 翻译症? 翻译腔? [J]. 中国科技术语, 2009 (3): 52-54.
- [23] 于建红. 从权力话语理论解读翻译过程 [J]. 安徽文学 (下半月), 2008 (8): 304-305.
- [24] 张思洁, 张柏然. 形合与意合的哲学思维反思 [J]. 中国翻译, 2001 (4): 13-18.

## On Positive Translationese

Feng Man Duan Anq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Translationese, as a failure to reproduce the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the original text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source language forms, has long been criticized and considered as a disease that shall be cured if one desires to improve one's translation ability. However, the translated text produced by translator who has to mediate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esthetics, and social conventions between two cultures, is in nature an intermediate — a special existence between texts meant to be written in both mother languages (in source culture and target culture). Does this special existence imply the continuum where translationese may have some space for reasonable existence? Current researches on “translationese” tend to study the issue from language perspectives, with less attention paid to complex social factors behind it and translators' autonomous choice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clarifying Chinese names for translationese and analyzing reasons of its occurrence. Drawing upon the argument that translation product is an unstable intermediat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ranslationese can be divided into negative and positive translationese, which shall be treated dialectically, and it is translators' duty to produce positive translationese out of sincerity.

**Key words:** Intermediate; Positive translationese; Negative translationese; Rationality